



新知识分子

汇编13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2019年2月

放眼望去，处处是深渊。棘手的经济危机、深刻的社会和环境问题逼迫着本身就处于气候灾难危险之中的地球。早在几十年前就向垄断资本主义投降的自由主义更是在这些问题面前瑟瑟发抖。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巴西、菲律宾还是波兰，普京、埃尔多安、杜特尔特、特朗普、莫迪这些铁腕人物都把自己当成了救世主。现在似乎很难再找到新的想法，尤其是能激发未来希望的想法。这就是我们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一直在奋战的时代。在汇编 13 中，我们简述了对自己工作的理解、对思想之争的参与以及培养新知识分子承诺。这两件事（思想之争和新知识分子）构成了本汇编的前两部分。在第三部分，本汇编对我们的政治背景进行了简要讨论，并提供了一张地图、一份索引，呈现了我们关注的问题和研究工作。期待您能回应我们发出的对话邀请。

封面人物（从顶部左端，顺时针方向）：

安德莉·布劳因 (Andrée Blouin)、玛丽埃尔·弗朗戈 (Marielle Franco)、温妮·玛蒂基泽拉·曼德拉 (Winnie Madikizela-Mandela)、乌戈·查韦斯 (Hugo Chávez)、安娜·茱莉亚·库帕 (Anna Julia Cooper)、亚历山德拉·柯伦泰 (Alexandra Kollontai)、比尔玛·埃斯平 (Vilma Espín)、阿娜希塔·拉特布扎德 (Anahita Ratebzad)、弗朗茨·法农 (Frantz Fanon)、戈达瓦里·帕鲁勒卡尔 (Godavari Parulekar)、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第一部分： 思想之争

1999年，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向公众介绍了“思想之争”（Battle of Ideas）的概念。有两个平行的事态发展迫使卡斯特罗发起了一场关于思想和道德观念的公开运动，这两件事便是苏联的解体及其对古巴的影响。

(1) 苏联的解体

1991年，随着1917年十月革命而诞生的苏联解体了。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及其亲密盟友似乎成了一场界定人类道路的宏大斗争的胜利者。当时，一位年轻的美国国务院雇员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运用他对黑格尔（G.W.F. Hegel, 1770-1831）理念的理解，宣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历史的终结”。不可能会有新的道路。现在的道路将永远延续下去。对福山来说，当下最重要的因素有以下三点：

- (1) 以美国及其盟国为主导力量的世界秩序。
- (2) 确保垄断资本主义永久存在的自由贸易政策。
- (3) 需要向那些在独裁统治以及君主政体下仍然存续的国家输出自由民主政府形式。

福山等人对马克思主义表示不屑，它被视为时代错误。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冷战中已经被击败。对他们来说，苏联解体的本质，是一场历史性伟大战役的投降，这场战役随着18世纪法国（1789-1799）、海地（1791-1804）和美国（1775-1783）的革命而展开。20世纪的黑格尔学派认为，这些革命引发了自由和平等理念之间的辩论。自由的理念意味着必须保护个人不受国家干预，而平等的理念意味着必须使用所有工具（包括国家干预）来创建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平等的力量（即那些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力量）大致失败了，而自由的力量（即那些希望资本主义自由运行的力量）胜利了。

卡斯特罗说到，在美国得逞的背景下，新时代迫使左翼进入一场思想之争，并且与企图创造有产者乐园的新自由主义者进行强有力的交锋。卡斯特罗说到，资产阶级的观念令人窒息。他们设想社会心理的味觉完全可以由贪婪来理解，利润最大化（也就是商人的情感幅度）能够描述所有的人类行为。

卡斯特罗在加拉加斯（委内瑞拉）说到，他们相信人类是一种“在受到胡萝卜的引诱或是被鞭子抽打时才会动起来”的动物。新自由主义者不认为人类是复杂的，他们不认为我们会爱、会表示关心、会有想法或是会思考。卡斯特罗说，我们必须在这一层面进行干预，正如在政治和地缘政治层面进行干预。学术界的大门慢慢地向马克思主义世界和其他解放理论关闭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卡斯特罗和古巴政府发起了思想之战，这是一场捍卫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战斗。卡斯特罗在这里引用了他的英雄何塞·马蒂的话：思想的战壕和石头的战壕同样重要，不同文化和知识机构内部的斗争和街头的斗争同样重要。



(2) 苏联解体对古巴的影响

苏联的解体给古巴带来了非常艰巨的挑战。简单地说，古巴的小麦和大米进口一直依赖苏联。随着苏联的解体，古巴越来越难买到面粉，同时，古巴对苏联和东欧集团国家的糖出口也大幅下降。1991年，俄罗斯新总统叶利钦终止了对古巴的所有援助。从1990年到1993年，古巴的进口锐减了一半，国内生产总值缩减了35%。这是一场灾难。在1991年9月的第4次党代会上，卡斯特罗告诉他的同志们，崩溃的苏联无法履行其42%的合同。这对机器升级和面包店的面粉供应产生了影响。苏联和东欧国家曾基于团结的目的提供船只将古巴农产品（柑橘、糖）运往欧洲和苏联，现在则要求以硬通货收取费用。这对古巴来说是不可能的。美国的禁运更加严厉，古巴也越来越孤立。

正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古巴进入了所谓“和平年代的特殊时期”。这一特殊时期旨在强调采取新政策和作出重大牺牲的必要性，以完全摆脱古巴对苏联和东欧的依赖，并实现更大的经济自主。新政策摇摆不定，导致有些部门更加自力更生，有些部门对外国经济援助（包括旅游业）的依赖则更大了。这一特殊时期的亮点包括：推进自给自足的生态农业，建立在破坏环境（包括古巴广阔的珊瑚礁）的前提下治理环境的新机构，为古巴的能源需求鼓励发展可更新资源。但这些不足以解决该国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迫不得已，古巴只能进一步发展旅游业和采矿业。卡斯特罗和古巴政府无法为古巴经济的薄弱性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古巴为美国禁运所困，也无法找到基于团结的目的进行贸易的全球盟友。

思想之争提供了一种机制，激励公众采取行动，对抗由旅游业、资源开采和经济困境引发的意识形态混乱。共产主义青年团带头，通过群众斗争捍卫共产主义价值观，阐释帝国主义在扼杀古巴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解放“古巴五人”（他们受到间谍罪的指控，被关押在迈阿密）的运动，以及让埃利安·冈萨雷斯（Elian Gonzalez）重返古巴的运动，这些动员活动将古巴年轻人凝聚在了一起。

1991年，卡斯特罗告诉墨西哥杂志 *Siempre*：社会主义不仅仅是物质匮乏的解决方案；苏联没有能够开展思想之争。

我认为这些变化在历史上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想法不能有。我不能采用这种宿命论的方法，因为我认为，资本主义卷土重来、社会主义阵地消失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主观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这里面存在各种各样的错误，比如脱离群众。如果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可以说，由于群众背离了社会主义理想，在意识形态上产生了重大的薄弱点，而在社会主义理想中，人的团结是首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真正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被忽视，物质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部分遭到忽视，而物质的部分却被强化了。突然之间，根据各种声明、演讲和文件，社会主义的目标似乎仅仅着眼于提高人民每年的生活水平：布料多一点，奶酪多一点，牛奶多一点，火腿多一点，物质的东西多一点。在我看来，社会主义是人民生活的一次彻底变化，是建立新的价值观和一种以人民团结而非自私自利、个人主义为主要基石的新文化。

关于团结的讨论、以共产主义道德为基础建设古巴社会的讨论深入人心，这就是古巴思想之争的国内背景。自思想之争发动以来的这二十年内，变化相当之多。

* 菲德尔·卡斯特罗



玻利瓦尔计划 (Bolivarian project) 在拉丁美洲的开展, 使古巴从绝境中得以短暂恢复。1999 年, 正当古巴发动思想之争时, 委内瑞拉新当选总统乌戈·查韦斯访问了哈瓦那, 他说: “委内瑞拉正与古巴人民迈向同一片海洋, 一片洋溢着幸福、真正社会正义与和平的海洋。” 2004 年, 古巴和委内瑞拉开始团结贸易, 其中包括修建一条从南美到被禁运的古巴的光纤电缆。贸易增加, 委内瑞拉石油输入古巴, 委内瑞拉欢迎古巴提供的技术援助。但这个时期是短暂的。帝国主义对委内瑞拉和古巴的攻击来得很快, 委内瑞拉目前的危机对古巴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美国国务院 (State Department) 官员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已收回了自己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他把历史的终点推迟了。现在, 当一些书籍提出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已经高得离谱时, 这些书开始受到认真对待。2007 年至 2008 年的信贷危机促使许多严肃的评论家表示, 需要重新关注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的观点。在西方核心地带, 社会主义政治家有了全新的开始, 而支持马克思主义的抗议活动在加州奥克兰乃至法国巴黎等地爆发。资产阶级使用催泪瓦斯和泰瑟枪, 霸权主义式微的迹象日渐显现。现在, 被大众视为百分之一的那群人也不再假装拥有对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了。很少有人相信私有化和创业是未来的出路, 连亿万富翁都怀疑自己能否掌控世界秩序。当气候变化日趋严重, 碎片化社会中的暴徒冲向他们时, 他们被高墙保卫、警卫把守的门禁社区已经不够了。以色列在加沙隔离墙攻击巴勒斯坦人, 美国在里奥格兰德 (Rio Grande) 隔离墙攻击洪都拉斯人, 这些事件都是现状的缩影。历史并没有结束。当前秩序与未来希望之间的力量对比仍在此消彼长。

* 比尔玛·埃斯平

第二部分： 老鼠知道的那些事

从 1845 年开始，卡尔·马克思在他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十一篇论文中写了一句从此名扬天下的话：哲学家迄今为止只是解释了世界；然而，关键是要改变世界。马克思的意思很清楚：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忙于解释人类的故事，他们似乎不想做任何改变。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现象并没有困扰他们。两年前，马克思提出了一句拉丁语的口号：“muta pecora, prona et ventri obedientia”，即群众是沉默的、顺从的、唯口腹之欲是从的。这种态度必须结束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第三篇论文往往被忽视：教育者自己必须先受教育。如何教育教育者，也就是知识分子？马克思写道，通过“革命实践”。“革命实践”的理念既是指对社会的一种态度，也是指参与社会变革的义务。这种对社会的态度、这种立场表示社会形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总是处在运动中。既然社会形式是运动的，就有可能把它们改造得更为人性化，这是知识分子的任务。

马克思认为，人们对改变的渴望不容否认。正是这种变革的渴望激励着马克思这样的知识分子去探究社会不平等和苦难的根源。带领他们到达真理的不仅是拒绝资产阶级方法论、建立新的知识体系，他们的新方法（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包含更先进的解决工具，而必须从历史的视角看待现实。认识到理念是具有时代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的，必须认识到人类制度与社会进程是有来处，也因此是有去处的。

这是马克思之后的几代人所吸取的教训，来自不同阶级背景和不同民族的知识分子转向自己所在的社会去了解它们、改造它们。知识分子获得解放的希望已经显现。

但是，这种知识分子思想，无论学术还是艺术都属于少数派。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投身于解放运动。社会地位、金钱、上帝等旧有承诺的诱惑是难以避免的。马克思对那些只解释世界而不寻求改变世界者的尖刻评论是针对特定的知识分子阶层的。这些知识分子不问世事，不觉得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受到不平等、战争、苦难、斗争的困扰。这些知识分子属于机构的一份子，但他们把这些机构看成众神居住的奥林匹斯山大本营，并不觉得自身是国家和社会利用剩余价值建立的这些机构的产物。

诸如此类的教授有着诸如此类的奇思妙想，但谁来打扫他们的办公室？谁帮他们做了研究？是谁交付了剩余劳动时间而让教授得以偷闲？谁？这些教授可不在乎。这些教授觉得生活本该是自由自在的，可以随心所欲、任意而为。这些教授对世界没有义务。这些教授写的是世界，但他们像上帝一样，自以为可以在教授高位之上俯视世界上的种种矛盾，殊不知教授高位正是这些矛盾的产物。

这种超然的姿态是可能的，它已经伴随我们几个世纪了，保卫它的是高墙与学位、保安与行话。事实上，正如弗朗茨·法农 (Frantz Fanon) 所写的，行话是危险的。法农写道：“话语隐晦是一个面具，它的背后显现出变本加厉的掠夺行为。”知识分子必须让整个体系简单明了。与此同时，啃食教授笔记的老鼠知道，知识分子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扎根于这个世界，有自己的阶级习惯，具有所在阶级的本能。用法农的话来说，致力于工人阶级和无产者事业的知识分子知道“一切皆可向人民解释，唯一的前提是你真心希望他们理解。”

这些知识分子中最优秀者想要理解世界，为自己看到的事物寻求历史乃至历史之外的解释。但是，在马克思的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描写世界时无意改变自己观察到的情况。他们的作品是阐释性的文本，这些文本一开始就是对现实的态度，表示现实在本质上是难以解决的。即使是那些发现问题并想要改变现状的人也未必会研究运动中的现实，即存在变革可能性的现实。为了表明这一立场，马克思那句重要名言（哲学家到目前为止只解释了世界；然而，关键是要改变世界）表示，是要从根本上相信改变的可能性，并在现在的基础上追寻未来的解放之路。

* 卡尔·马克思



在马克思写下这句话的半个世纪后，意大利共产主义斗士安东尼奥·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重提解放知识分子的主题。葛兰西明确表示，知识分子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很多种。不能认为知识分子的活动必将导致对社会主义的忠诚。葛兰西指出，大多数知识分子要么反对任何变革，要么认为自己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解放派，而是技术思想家。为此，葛兰西提供了一套有效区分有机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和新型知识分子的方法。

知识分子本身并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扎根于自己出身的阶级；对原先的阶级做出承诺或者对其他阶级做出新承诺。关于这一点，葛兰西在狱中明确写道：

伴随经济生产界的某个关键功能应运而生的每个社会群体在自我创造的同时会创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这就使它具有了同质性，并意识到自身在经济乃至社会、政治领域的功能。资本主义企业家除了自我创造之外，还创造了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学专家、新文化和新法律秩序的组织者等等。

因此，每个阶级都产生知识分子。资产阶级需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专家”）和广告主管（“新文化的组织者”）。这些知识分子中的每一个都把自己当作是中立的、超越阶级的、务实的科学家。但实际上，他们是受特定阶级立场、特定世界观支配的，这种世界观受到资产阶级利益和需求的塑造。例如，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会坚持认为世上的饥饿现象是资源短缺的结果；这位经济学家不愿意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全世界食品产量相当于食品需求的 150%。农民有自己的知识分子：了解作物病害和天气的农民，其他农民会向他们咨询田间灾害问题或寻求灌溉的建议。他们是农民知识分子。每一个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在的阶级来说都是有机的组成部分，他们是**有机知识分子** (organic intellectuals)。葛兰西指出，这些知识分子使得各自的阶级带有“同质性并认识到自身的功能”。

然而，只有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才能把自己的社会生活观念确立为普遍观念。他们能通过某个社会学科的谎言来掩饰自己的阶级偏见，建立一些貌似纯粹而非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范畴和概念。例如，在主流经济学中，稀缺性是一个为该学科定型的概念。既然稀缺性是主要概念，该学科就会提出下一个问题：如何最优分配稀缺商品，而答案就是“市场”。但即便这个“市场”也不是一个中性术语。它隐藏的事实是，塑造市场的是社会结构，是那些有权定义市场的人。例如，“市场选择”就意味着那些饥饿的穷人就没资格吃饭。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的数据表明，在我们这个时代，大约有 10 亿人在挨饿。这个数字非常保守，单单印度就有大约 7 亿人在挨饿。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市场决定价格，而价格是配置稀缺资源的最佳方式。这被认为是一个中立的观点，而实际上这是与统治阶级有机结合的知识分子的观点。

扎根于其他阶级（如农民）世界观的知识分子可能会问：食物生产者凭什么就吃不起食物呢？这个世界生产的食物怎么会超过了填饱肚子需要的量呢？剩下的食物怎么办？为什么政府会销毁食物而不是用来喂饱饥民呢？这些是知识界谎言之外的问题，编织这些谎言的是那些接受了精英集团阶级观点的知识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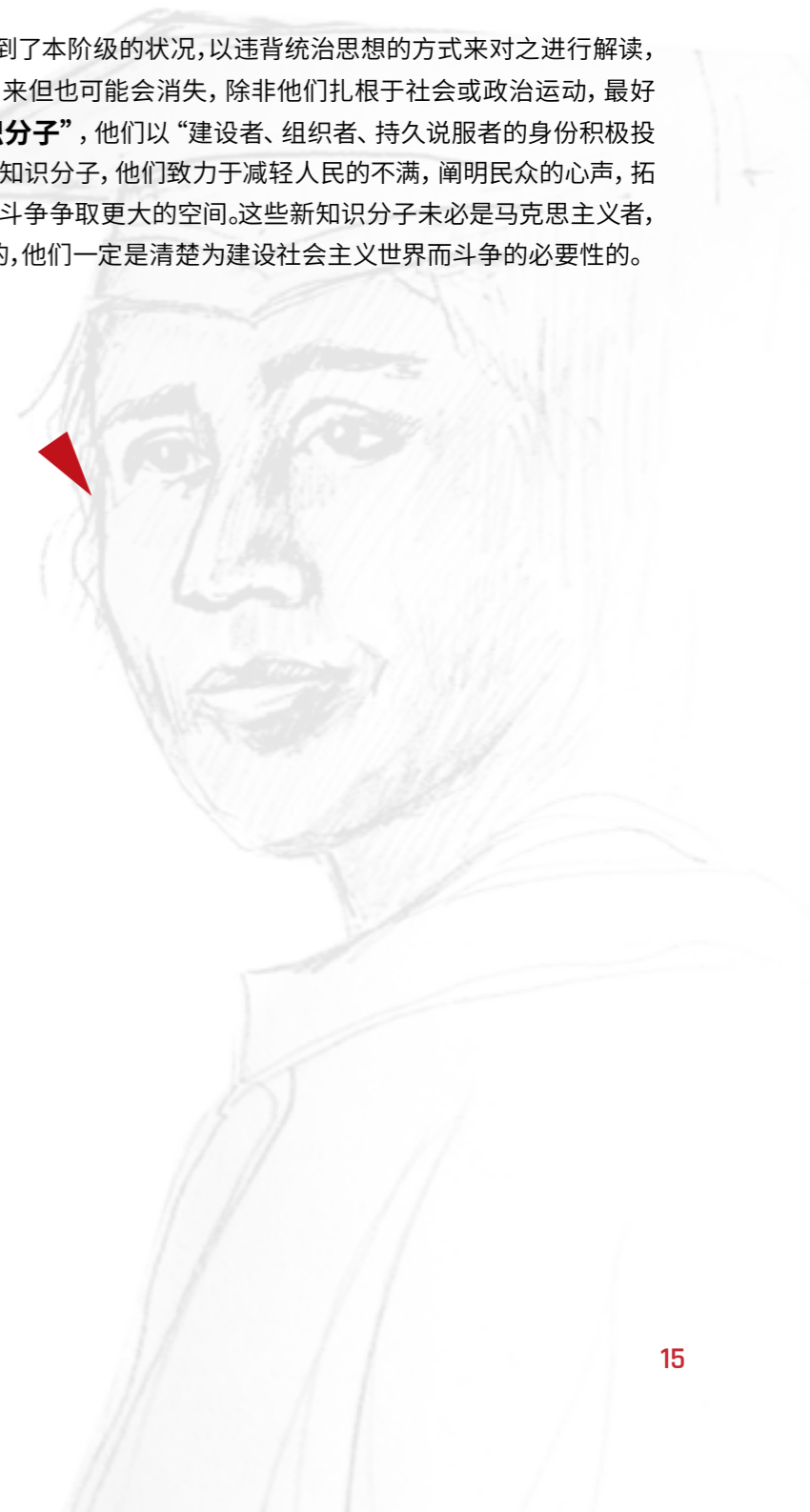
* 弗朗茨·法农



农民知识分子不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样受到重视。在每一种社会形态中，统治阶级都决定了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正确的。因此，统治阶级知识分子被视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且是**传统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和广告主管是该秩序中的传统知识分子，但牧师、地主等旧时代的遗老遗少也属于此列。

在葛兰西看来，有机知识分子或传统知识分子并不是天生保守或激进的。扎根于统治阶级的传统知识分子通常是保守的，反对扰乱社会秩序的体制变革。不同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往往受到传统知识分子思维方式的支配，因此他们往往也是保守的，不热衷于变革。成为牧师或律师的农民知识分子会受到宗教和司法机构的社会保守观念的束缚。这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评论：“每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但是，劳动人民中也有一些有机知识分子看到了本阶级的状况，以违背统治思想的方式来对之进行解读，对世界产生了激进的认识。他们的观点会涌现出来但也可能会消失，除非他们扎根于社会或政治运动，最好是某个政党。葛兰西称这些知识分子为“**新知识分子**”，他们以“建设者、组织者、持久说服者的身份积极投身于现实生活。”葛兰西指出，持久说服者，即新知识分子，他们致力于减轻人民的不满，阐明民众的心声，拓展令人窒息的狭隘思想，为求生存、求胜利的人民斗争争取更大的空间。这些新知识分子未必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一定是投入到人民主要阶级的斗争中去的，他们一定是清楚为建设社会主义世界而斗争的必要性的。



* 安东尼奥·葛兰西

第三部分： 我们的现状 及我们的研究

1935年，德国马克思主义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Bertolt Brecht) 写下一段关于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话：“那些反对法西斯但不反对资本主义的人想吃牛肉，却不喜欢看到鲜血。如果屠夫在称肉之前洗手，这些人轻易就会心安理得。他们并不反对造成野蛮的财产关系，他们只是反对野蛮本身。”

“财产关系”指的是资本主义，即世界上少数人拥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这种社会财富会被顺势用来雇佣人类、开发自然，原因无他，只是为用钱赚钱，也就是为了利润。对人类和自然的关心并不能驱动这种资本的投资，因资本的本性就是贪婪的。

这种资本有别于人类生活，渴望不惜一切代价积累越来越多的资本。驱动少数人（资本家）的是通过寻求更高的获利来增加利润。

在周期中，资本家发现并没有轻松安全的投资可确保获利。这种获利风险导致了两种罢工现象：

(1) 首先是**税收罢工 (tax strike)**，资本家利用政治权力减轻自己的税收负担、增加他们的财富。

(2) 其次是**投资罢工 (investment strike)**，资本家不再投资生产部门，而是将财富进行投机保值。

资本家的罢工行为把社会财富从社会用途中抽走，浇灭了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前景。随着自动化和生产力的提高，资本家开始用机器代替工人，或者通过提高生产过程的效率来取代工人。在这种情况下，投资用于机器和工作场所的效率，但它们对社会的影响与投资罢工一样，即就业人数减少，而永久失业的人数增加。

收入与财富的高度不平等以及大部分人美好生活愿景的破灭给体制带来严重的合法性危机。那些努力工作但是并没有获得回报的人开始怀疑这个体制，尤其是当他们无法摆脱使其陷入贫穷的“财产关系”时。支持“财产关系”以及呼吁走投无路者去创业的主流政客不再被视为是可信之人。

我们希望能提供一些例子，说明为了满足人民愿景而建设的可能未来，分享这一未来在现在的点点微光。

像特朗普(Trump)和博尔索纳罗(Bolsonaro)这样的铁腕人物势力所及的地方似乎不可能有这样的未来。他们因主流政治家算盘落空而贬低他们，但他们也没有为不断升级的危机提供一致的解决方案。相反，这些铁腕人物把大部分人的希望受挫归咎于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包括社会少数群体、移民、难民等没有社会能力的人。铁腕人物向弱者亮出獠牙，弱者则惹怒了那些空有抱负却无法实现的人。帝国主义战争发端于中亚，沿着弧线一路到达南美，并不断加剧。人道主义干预的遮羞布漫不经心地掩盖了再次殖民和盗取资源的现实。这些铁腕之人利用了人民的挫折感，却没有提供任何合理的出路来摆脱高度不平等和经济动荡的局面。

解释这个问题的一个理论是消费不足理论。这一理论的大意是，人民群众无法购买被生产出来的商品，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收入购买。这是需求侧的问题。如果有办法给人民群众多发点钱，那么他们就可以增加消费，从而把资本主义从危机中拯救出来。



解决消费不足问题的一个方法是向人们增加私人信贷的提供，然后利用广告宣传鼓励他们超前消费。他们将负债，但是他们的消费将刺激经济走出危机（希望如此）。最终，这些人将无力偿还债务，他们的债务越滚越大，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借款人破产时，政府将被迫举债，以减轻银行的负担。当政府举债拯救银行时，他们就承担了银行的义务。这迫使政府削减自身的预算，主要是削减社会支出。银行为解决消费不足问题提供私人信贷，通常会导致政府负债，然后会进一步紧缩开支。

解决**消费不足**问题的第二种方法是政府通过减税或直接现金转移计划给予消费者经济激励。不管用哪种方式，政府把钱交给民众，鼓励他们购买商品，从而刺激经济。政府又一次为了解决资本主义问题而负债。债务将再次膨胀，政府将不得不实施紧缩计划，以安抚债权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紧缩政策将再次出现，再次抑制公众的购买力。

这一循环将会继续，正如阿根廷、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一样。

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国家，为了增加总消费、拯救资本主义，他们都将背负债务。通过这种方法，资本本身不需要做出任何牺牲，它可以追求盈利战略。

资本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提高获利能力，比如：

(1) 用机器代替人或提高人的效率。这使得企业可以少雇人，利用自动化和生产率的提高，利用自身的有效竞争力来消灭竞争对手。

(2) 将工厂转移到工资水平较低、工作场所、工作环境监管制度受到压制的地区。

(3) 通过税收罢工减轻税收负担，将资金转移到避税港。

(4) 将资本从生产活动转出，用于金融、贸易和寻租活动。

(5) 以低成本收购公共资产，并将其货币化以获取利润。

这些策略使得资本家得以增加财富，但同时使得其他人以及社会陷入贫穷。

民众需要爱国，资本却只需要获利即可。

对左翼而言，这种情况带来了严峻挑战。第一种挑战是找到办法动员感到社会破碎、前路迷茫的人。第二种挑战包括如何从这一体制及其局限性中找到政策出路。

为了组织人民群众反抗这个无可救药的体制，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1) 愿望。在过去的 50 年里，资本家的媒体和广告业创造了一系列的愿望，这些愿望破坏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文化，也破坏了过去传统文化界。现在的年轻人对生活有更多的期望，这是一件好事，但这些期望缺少社会性，更多的是关于个人性，而个人的希望往往依附于这样或那样的商品。自由就是购物，购物就是活着，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座右铭。但那些购买力低、为了梦想而负债的人也会不断失望，铁腕人物正是把这种失望引向了仇恨。左翼运动能把这种失望引向富有成效的希望吗？

(2) 碎片化。国家削减社会服务、社会生活日益私有化以及与数码世界的互动呈天文数字增长，这些都加剧了人际互动的碎片化。以前人们交换思想和商品，互相帮助，互相启发，现在这种面对面交流的场所越来越少了。社会分裂、人们为了生存疲于奔命，这使得左翼更难凝聚人心，引发社会变革。电视和社交媒体现在主导着通讯世界。这些场所都是由垄断资本家的公司所拥有。左派一直依赖社会机构作为信息传播者。这些社会纽带一旦断裂，左翼也随之瓦解。左翼运动能否帮助重建这些机构和进程，重建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社会？

(3) 局外人。铁腕人物把矛头指向“局外人”：社会少数群体、移民、难民等毫无社会能力的人群。极右势力正是通过针对这些人增强了势力。如果不坚定地捍卫“局外人”，完全摒弃充斥社会的法西斯仇恨思想和生态，左翼就不可能重新崛起。建立爱的政治比建立恨的政治更难。左翼运动能发展出一种“爱的政治”来吸引大众吗？

(4) 信心。人民政治的根基是信心，如果人民对改革或制度变革的活动没有信心，那么他们就不会积极参与。一波波的反抗风潮往往能增加人们的信心，但即使在这里，重点也不是最后加入抗议的那个人，而是最初几个组建网络以酝酿抗议活动的人。社会衰退导致人们缺乏进行政治变革的信心，特别是当这种有抱负的社会声称，唯一必要的改变是人人都要去创业。左翼是否能够催生一种未来有希望的感觉，使人民产生信心，为创建未来而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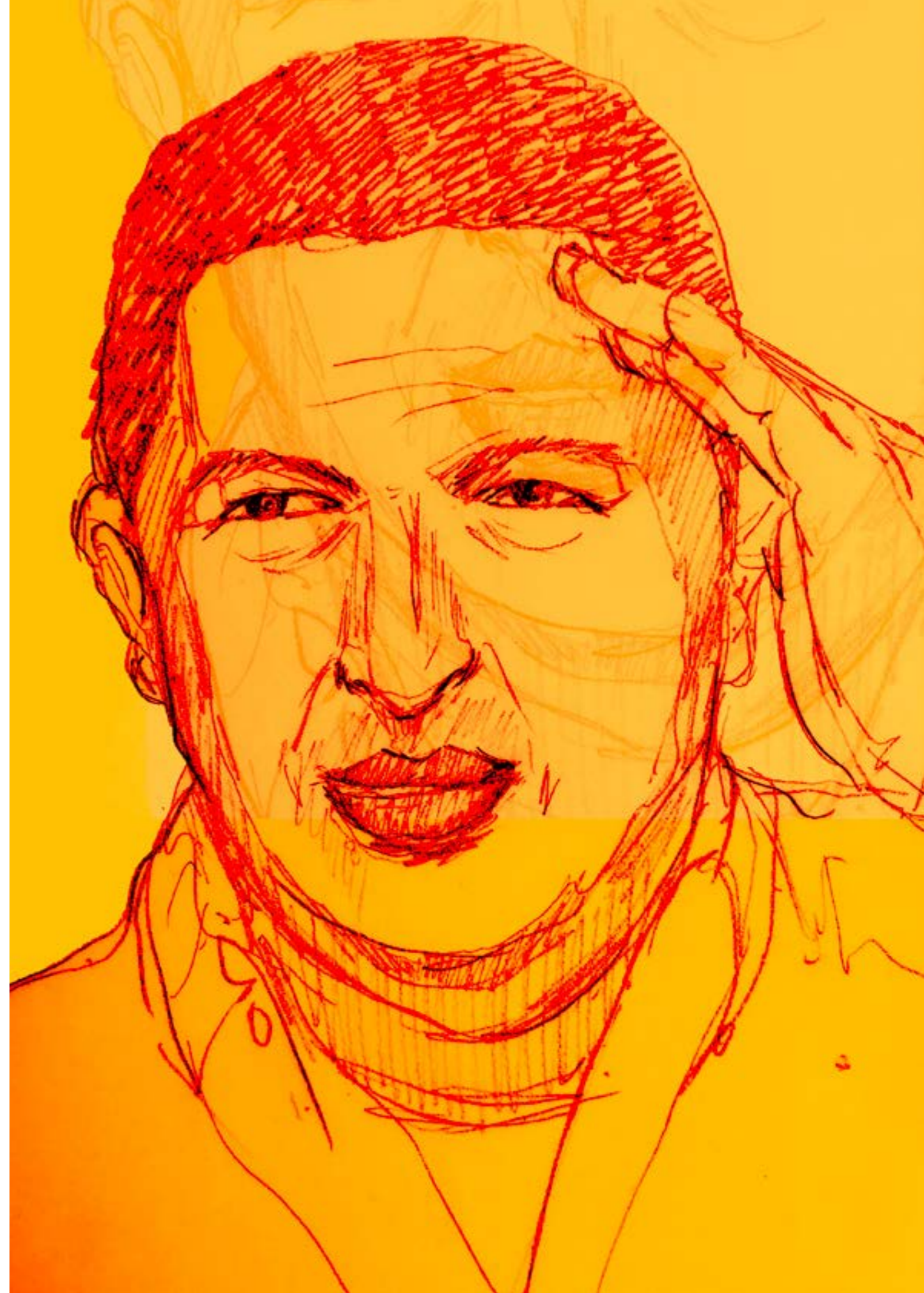
(5) 没有民主的民主。在没有民主的社会里，这个问题并不直接相关。在这些地方，最紧迫的任务是赢得充分的民主。在那些民主是主要形式的社会里，或者至少存在民主幻想的社会里，寡头政治和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削弱民主，在不中止民主的情况下统治社会。它们使用的方法是复杂的，包括使国家机构丧失合法性、打压选举、利用金钱导致选举进程的腐败、通过社交媒体和广告诋毁反对派候选人、利用一个民主体制中最不民主的机构（比如非经选举产生的司法机关）来侵蚀民选官员的权力。左翼能否捍卫民主理念免受损害，防止民主沦为仅有选举和选举制度的情况？

一旦动员了人民去争取革新世界体系，我们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框架？在这方面，知识分子必须全力以赴。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用各种创新方式，利用我们的社会财富来解决人类眼前的问题：饥饿、疾病、气候灾难。我们需要想方设法地根除战争的根源。我们需要发挥创造力，围绕合作社等形式重建生产部门。我们需要用社会财富来丰富自己的文化，创造更多让我们互动、创造文化艺术的实体场所。我们需要利用社会财富来创造人不必要为生存而被迫工作、工作服从于人类聪明才智和激情的社会。

* 玛丽埃尔·佛朗戈

我们研究所的一个主要特色是发展未来的理论。今天有哪些未来的元素可用？仅仅调查目前的问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我们要参与关于转型社会的讨论。为此，我们会调查当前鼓励新生活方式和新生产方式的项目。目前暴行泛滥的一大负面作用是，人们觉得除了这个噩梦之外毫无盼头，也无法想象出替代方案，徒劳的感觉令人们无法顾及改变未来。坚韧不拔的人们总会进行尝试，此时当权者就会拼命扼杀这些尝试。对有权有势、有产者来说，任何替代模式最好都不要发展壮大。它会让人们质疑这一说法：如今统治世界的势力是永垂不朽的，历史已经终结。

把这些希望视为天真的想法是不近情理的。这一情况非常能说明，想象地球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末日更容易；想象极地冰盖淹没灭绝人类比想象生产力令人类共同富裕更容易。这一情况特别能说明，我们一心希望人性泯灭，而不是表现出关注人类潜能的姿态，这些潜在在印度喀拉拉邦的合作社、在阿根廷声援受排斥工人的运动中可见一斑；也能说明，我们对巴西无地劳工和南非棚户居民建设的世界视而不见。不该嘲讽这些进展，不该讥笑这些创举。在这些进展中可以看到未来的种子，其中蕴藏着人类的另一条道路。



* 乌戈·查韦斯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是一个国际性的研究机构，发轫于人民运动中，为知识分子间的观点交锋搭建平台，并以倾力于实现人民的愿景为宗旨。

www.thetricontinental.org